

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的生成

刘保庆

(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现代意义“文学”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 梁启超的贡献不可或缺。但是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常被视作文学功能论而被轻视。现代“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梁启超“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作为群治的文学”“作为世界的文学”三个内在观念的逻辑演变。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不仅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生成, 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而且保持了“文学”与现实世界的丰富和有机联系, 影响深远。

关键词: 梁启超; 国民教育; 群治; 世界; 现代文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2-0088-08

收稿日期: 2024-01-09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1BWX010); 梁启超文学观念的生成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河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2019SBS001); 新媒体与传播的情感维度。

作者简介: 刘保庆(1981-), 男, 河南内黄人, 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2.003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他早期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 更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研究梁启超早期文学思想演变, 不仅具有个案意义, 而且能够深化对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理解。

梁启超文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对梁启超小说观念、文学思想、趣味美学等做出了全面、系统、客观的梳理, 而且从现代性理论、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等等视角揭示了梁启超的贡献。^①但是有些问题还少有人思考, 比如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是如何生成的? 其生成过程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发展和演变? 这里有个研究预设, 梁启超虽然各个时期思想变化很大, 但是对文学的思考有内在的逻辑。

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有三个观念构成了它出现的根基: 一是“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文学是“启民智”的重要方式, 世界文明和国民话语是文学生成的前提预设。二是“作为群治的文学”。文学是沟通国民, 打造群体共通感的精神形式。三是“作为世界的文学”。文学通过创作一个“世界外之世界”来改造现实世界。这三个观念在梁启超文学思想中虽然不是都很明显, 但是内在逻辑确实存在, 具有潜在的内在联系。

一、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

今天, 我们所使用的“文学”一词, 其现代意义的获得恰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文学”概念隐含了这样的问题: 谁的文学? 为谁的文学? 这个问题后来最集中的体现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②文学为谁服务?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文学的服务对象, 而且关涉文学本身的性质和界定。

^①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代表性学术著述有: 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 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年; 关爱和等:《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年; 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文史哲》2000 年第 2 期, 等等。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847-879 页。

20 世纪许多文学大讨论中,文学的“主体性”是重要的核心命题。陈独秀提出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共产党在根据地提倡“人民文学”等等,都与文学“为谁”的“主体性”问题有关。

种种思考背后隐含一种新的思考“文学”的范式:“民”。这里所说的“民”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①而是“国民”,背后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和全球万国争存语境。将“国民”作为认识文学、改造文学、创作文学乃至转变文学体制的范式主要基于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文学现状的考察。将其称为新范式,不仅仅因为出现了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曲在内的“文学”范畴,在此之前,经、史、子、集是古代文献典籍的划分部类。今天归属到“文学”范畴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在古代则分散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当中。“文学”属于现代对文献著作新的划分方式。

这种划分方式的出现离不开“国民”话语,有学者已经指出梁启超的根本思想是国家主义。^②如何在全球万国争存的环境中生存并保持自身的强大,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梁启超的思考路径虽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变化,但这个根本问题以及从“国民”入手之思从来不变,在当时也是引领时代之先的。^③对“国民”的发现和重视源于梁启超对全球万国争存局面的新思考。整部“世界史”被纳入视野,“古代王朝争存”和“现代万国争存”有根本不同,前者被梁启超称为“国家竞争”,后者被称为“国民竞争”。这里“国家竞争”中的“国家”并非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古代以国为一家之私的王朝。王朝的更替只是皇权的迭代,与百姓无关,自然力量弱小,如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现代万国争存是所有国民参与,其原动力也非古代王朝的一己之私,而是全球经济资本主义。^④

在全球背景下,“国家竞争”的模式和思维自然无法力敌“国民竞争”。这倒不仅源于国民竞争模式中国民凝聚力强。梁启超特意发明了“无形瓜分”概念,^⑤指除了军事战争之外所有其他殖民的形式,如铁路权、财权、练兵权、用人权等等。既然现代全球万国争存属于国民竞争,培养“国民”或者说培养适合现代竞争需求的“国民”也就成为题中之义。

梁启超“启民智”思想改变了以往从上至下的治理模式,提供了从下往上的发展思路。在 1896 年的《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在批判此前“练兵”“开矿”“通商”等变法后,他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⑥虽然,这里仍然带有从上至下的治理模式,但是《学校总论》已经提出了“开民智为第一义”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意味着改革“官制”这一最后的从上至下的改革路径失效;此后,社会思想的变革使得立足于“民”,依靠底层“国民”的力量,引发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变革这一从下至上的改革路径具有了可能。“国民”改变国家在全球万国之林中地位的力量被梁启超称为“国民力”。“国民力”来自何处呢?梁启超给出的答案是来自自身,“行之维何?曰仍在国民力而已,国民何以能有力?力也者,非他人所能与我,我自育之而自伸之,自求之

① 古代有关“民”的思想非常丰富,如《尚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政之所行,在顺民心”,等等。

② 齐小刚:《国家主义:解读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密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

③ 严复 1895 年在《论世变之亟》文中提出“今日之世变”的思考命题,以“中西事理”对比的思考方式,提出了“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的观点,其中还包括“民智”“民力”等概念。参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1-5 页。

④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310 页:“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

⑤ 梁启超有时又用“暗力”一词,与“猛力”相对,“猛力”指对国家的侵略和威慑,“暗力”指对“国民”的侵犯,如办铁路、矿务、关税、租界、传教等等。这两个概念和文化殖民还有所不同。参见梁启超:《瓜分危言》,《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 294-298 页。

⑥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 15 页。

而自得之者也。”^① 因此，将古代不关心王朝的百姓转变成“国民”，激发、培养、提升“国民力”成为必然选择。

培养、教育“国民”，激发、提升“国民力”，实际上就是文明教育。“文学”在“文明三利器”^②学说中得以“显身”。梁启超“文明三利器”学说受到日本“犬养木堂”^③的影响，分别指学校、报纸和演说。报纸侧重面向能识字的受过教育的国民，演说侧重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国民。在《传播文明三利器》一文中，梁启超特意提及“小说”，“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④并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概念。学者多重视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的论述，其实梁的视野很开阔，还论述了描述法国、罗马革命，宣传民权自由等思想的西方近代历史小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得以“显身”，依靠的不是学校教育，也不是演讲演说，而是报纸这一现代媒介。“文学”的出现参与了报纸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文学尤其是小说借助报纸以想象方式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⑤以现代印刷术为技术支撑的报纸及印刷文学设定了极具想象性的整体概念“国民”与“国家”。

最大多数并且带有极强想象性色彩的“国民”成为“文学”出现的重要根基，借助“文学”对国民进行教育、宣传的思维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诗歌、小说、戏曲、散文还没有统一归属到“文学”的范畴。纵观古代文论，诗歌研究强调作者创作，但“为谁创作”基本上不构成问题，^⑥创作大多强调自然的感发。如“感物说”“缘情说”等等虽然强调重点不同，自然景物或者社会人事对创作主体的激发及创作主体由此产生的创作热情都是很清楚的。在风格上，古代诗论推崇“自然”“天然”等，和作为整体的“民”无关。冯梦龙在俗文学小说“三言”的序言中谈及收集、整理、编撰小说的目的，志在借助小说通俗的特点宣传儒家忠孝节义^⑦等思想，不仅缺乏报纸媒介所宣扬的现代民族国家意义，而且百姓作为受教育对象并不具备改造社会、国家的能动力。这与现代“文学”的出现不可同日而语。^⑧

二、作为群治的文学

“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内在隐含了民/国二元结构，国家由现代国民集合而成，国民又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年，由于排满革命、传统王朝意识等影响，清朝和现代国家认同之间无法形成统一。这就使得现代国家认同更多带有虚构想象色彩，^⑨国民教育充满悖论。为此，梁启超经常采用“群治”概念表达其政治理念。“群治”和“国民”话语有很多相通之处，许多情况下在梁启超文章中是可以互换的，^⑩但也有偏重。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里，梁启超提出两种努力的方向：“合大群”和

①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11页。

②有学者将“文学”视作传播文明的第四利器，其实并不准确，显然有拔高之嫌，无法描述“文学”在梁启超文明教育中的地位和结构。

③“犬养木堂”即日本第29任首相犬养毅。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犬养毅曾试图促进孙中山和康梁合作。1898年，梁启超创办横滨大同学校，也得到犬养毅、大隈重信的支持。

④梁启超：《自由书》，《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59页。

⑤[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33页。

⑥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唐代新乐府运动。

⑦[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⑧李爽学认为冯梦龙、凌濛初“在内的作家或编书家，都在长久以来备受排挤的小说与戏剧文类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可被视为文学现代化的先驱”。参见李爽学、张治：《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⑨这也造成此时期国族认同的各种想象，如黄帝形象塑造、中国及中华等概念的重构，对“未来中国”的想象等。

⑩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讨论了“独术”和“群术”的区别，实质上 and 后来提出的“国家竞争”和“国民竞争”是相通的。不过此时，梁启超又有所创造，在“国群”之外提出了“天下群”的概念。此后，“天下群”很少论及了。参见梁启超：《〈说群〉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93页。

“开人智”。^①“国民”话语更多倾向“开人智”，对世界发展趋势及本国发展历史、现状的认知；“群治”话语更多偏向群体的共同体和共通感，其中包含了培养国民共通感的文学思想。

“群治”概念的出现与近代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同时。严复于1897年翻译了斯宾塞的专著《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出版，引起极大反响。^②“群学”就是社会学，“群治”就是社会治理，“群术”即是社会治理之术。“群治”概念不仅避免了国民话语中“国”与“民”认同的尴尬，而且使得“社会”认知和管理模式逐渐出现，并最终形成了国民、群治（社会）、国家三个治理维度。如果说国家治理偏向顶层设计、制度规约等宏观层面，具有极高的强制性，那么梁启超“群治”更多偏向于国民精神、社会风气等意识层面，具有较强的引导性。除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还有专文《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在形塑国民精神的意义上，“群治”和文学、宗教、教育等具有相通性。

“一盘散沙论”在近现代影响很大，根据梁启超1900年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③“一盘散沙”应该最初源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讥诮，后来逐渐成为国人自我认识的意象。孙中山、鲁迅^④等人文章中都能看到“一盘散沙”意象。早在1896年的《说群》序中，梁启超原本打算借助康有为“群变”思想，结合严复《天演论》和谭嗣同《仁学》，作“说群”十篇，共120章，可惜终成未竟之作。改变“散沙”成就“民国”，成为时代问题。基于19世纪生物学、进化论提出的“合群”思想成为当时普遍给出的思路，这种“合群”思想甚至融合了物理学吸引力和排斥力观念。比如，时人认为，事物本身就具备“合群”性质，同时又与其他“群”相排斥。

无论是在梁启超有关“群治”的文章中，还是著名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都能看到有关生物进化、不同种群发展及人类种群的描述。虽然大谈特谈生物进化等突出合群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会感觉匪夷所思，但当时将小说在内的文学与合群思想联系在一起，很普遍，而且显得很“自然”。

“吾人于是考僵石之层，验山林之迹，视古初所传之器物，读初有文字之遗书，而知古人之所以胜庶物，而得以自存者，一在于能合群，二在于能假器。”^⑤从生物进化、各国文明发展等方面展开论述，显示了一切都是新问题，都要放到全球万国争存的语境中重估价值，凸显了“文学”出现初期从外围寻求自身合法性的需要。

文学是如何与“群治”建立联系的呢？文学可以打造“去塞求通”的共通感。1896年，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已经指出“观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⑥。因此，“去塞求通”不仅可以打通“比邻”隔阂，促进中西交流，而且可以打破“室内”上下不通的“散沙”状况。作为“三文明利器”之一的报纸可以实现“去塞求通”，以“报纸”为发表媒介的文学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打破中西内外隔阂，培养世界眼光，重新认识自我并改变自我，文学和报纸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

文学还可以凝聚民族精神。早在1899年《国民十大元气论》中，梁启超已经用“文明”来描述不同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状况，并且将“文明”划分为“形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二元对立结构中，精神是根本。“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⑦梁启超又用“国民之元气”来称呼“精神”。这里的“元气论”也就是民族精神论。梁启超《新民说》对“民族主义”（Na-

①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262页。

②[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

③这十种德性分别为“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利己与爱他”“自信与虚心”“破坏与成立”。它们之间两两“相反相成”，并非截然对立关系。

④“沙聚之邦转为人国”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命题，参见鲁迅：《文化偏执论》，《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4页。

⑤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⑥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66页。

⑦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267页。

tionalism) 有清晰的讨论。民族主义被视作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发达的根源,也是抵抗西方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的唯一有效道路。“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存亡的根本,由此形成国家本于国民,国民重在民族精神的思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②梁启超谈论民族主义的“同胞爱”同样基于素未谋面但是命运休戚与共的想象共同体意识。

文学恰恰成为打造民族精神的中介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第一段气势贯通,向来给人夸张之感,这也确实是梁启超行文的风格。但是如果把问题反过来,正是借助排比句,梁启超才形塑了小说(文学)的民族精神中介点论述,属于整篇文章的总纲性质。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③

这里,小说(文学)成为塑造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乃至新人格的所有源头。且不说梁启超论证是否严谨,因为这里与其说在论证,不妨说急于宣传,推出自己的观点。当然,这里的小说确切说应该指“政治小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引入日本“政治小说”概念,“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④。

政治小说使得以上国民教育和群治成为可能。这种政治小说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就是以本国政治家的经历为故事,从而达到政治宣传的目标。因此,政治小说是梁启超早期心目中最符合理想的小说。政治小说宣传功能较强,很适合培养民族共通感。比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艺术价值虽低,但是无论是“孔觉民”演说“六十年近世史”,还是“黄克强”“李去病”的争论,^⑤从文学叙事来说,是对“过去”的讲述,从读者阅读时代来讲,则意在激发爱国民族激情,打造民族认同感。

三、作为世界的文学

“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和“作为群治的文学”,都侧重“文学”的外在社会功能。“文学”自身特有属性还不明朗,其外在社会功能更多保留了报纸媒介的特性。梁启超早期对文学的思考也有一个从外到内,逐渐认识文学本质属性的递进过程。梁启超对“文学”自身独特属性的思考借助“作为世界的文学”观念得以显身。“作为世界的文学”观念蕴含在《世界外之世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中。

“作为世界的文学”第一个意思是:“文学”自身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并在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⑥“世界”一词源于佛家,也称“世间”。姜荣刚认为梁启超主要是从佛学的角度对“小说支配人道”进行阐释的,^⑦很有启示意义。但是单纯从佛学术语和思想本身阐释梁启超小说观反而无助于认识梁启超早期“文学”观念生成的内在理路,“世界外之世界”概念才是梁启超“文学”观念生成的基础。

①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56页。

②[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884页。

④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172页。

⑤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第十九卷,第5609-5637页。

⑥从空间、世界等角度阐释“文学”“中国文学”的相关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代表作有:周保欣:《‘中国文学’观念自明与现代文学起点》,《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周保欣:《‘天下’与‘列国’——中国文学古今演进的空间逻辑》,《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曹胜高:《想象世界与中国文学空间的早期建构》,《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⑦姜荣刚:《梁启超对‘小说支配人道’的佛学阐释》,《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世界外之世界”一词于1899年提出,收于《自由书》,旨在呼唤“造时势之人”。“造时势之人”并非身处世界而不出世俗“寻常人”,也并非能出世界而不能入的“高流者”,如山水诗人,而是既能入世界又能出世界的“真豪杰”“大人物”。“寻常人”和“高流者”是传统社会里人的类型,都无法应对近代中国面对的危机和困境。既能“入世界”又能“出世界”的新生存方式在古代社会看不到,是近现代社会的特征。古代“大隐隐朝市,小隐隐山林”^①中隐于“朝”并不同于梁启超的“入世界”又“出世界”。前者保持了精神的“出世界”状态,后者“出世界”又是为了再次“入世界”,这样才能“造时势”。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维度为古代隐士文化所缺乏。

“世界外之世界”这个概念内涵模糊。除了古代隐士文化和佛教有关“世界”认知^②的影响之外,这个概念的近代性质需要分析。这个概念应对的问题是:近现代全球万国争存格局或困境下人与世界如何相处?

“彼其于群雄扰攘四海鼎沸之顷,泊然置其身于世界外之世界,而放炯眼以照世界,知自己之为何人,知世界之为何状,己与世界有如何之关系,知己在世界当处如何之位置。”^③

“世界外之世界”结构与中国之于全球万国具有相通性。在传统天下观中,作为王朝存在的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近代地理大发现及经济资本主义的跨国影响乃至殖民主义,都使得原有“世界”被打破,一个全球万国的新“世界”以强势的方式被迫认知、感受。梁启超自身从“乡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的不断改变,何尝不是对世界感知的不断变化。另外,“世界外之世界”包含了一种近现代特有的结构主义认知模式:在全球万国争存中,每个国家都必须具有“世界视野”才能处理好本国事务,才能生存。

梁启超一开始就将“世界外之世界”概念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用于描述绘画、诗歌、小说等审美现象。它不仅可以描述英国小说里“狄西将军”身处沙漠独观世界,也可以指向写诗、画画时作家与创作对象的审美距离。

1902年,梁启超在阐释小说与群治之间关系时,“世界外之世界”这个概念深蕴其间。它不再单纯指向“真豪杰”“大人物”“造时势之人”,而是人人都有需求,即“人类之普遍性”。

“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④

个体常处于“现实世界”之内,不仅会产生有限性约束之痛苦,而且会带来精神的萎缩。^⑤也正因为个体存在自身局限性,摆脱个体有限性的需求才被激发出来了,即对“世界外之世界”的向往产生了。“文学”恰好提供了打通“世界外之世界”的路径,使得人可以走出现实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即“作为世界的文学”(或说“文学世界”)。由此,借助“世界外之世界”,“作为世界的文学”得以显身。可以说,梁启超“作为世界的文学”思想根源于现代个体的有限性。

因此,“作为世界的文学”就是将“文学”视作一个通往现实“世界外之世界”的契机。“作为世界的文学”改变了以往传统对小说的认识。小说的魅力不是因为“其浅而易解”,也不是“其乐而多趣”,而是作为“文学”使人实现了在现实世界和“世界外之世界”间的“游走”。

“小说”是体现“文学”导入于“世界外之世界”的最佳文体。学界向来强调梁启超提升小说文体地位之贡献,却往往对其内在机理分析不够,常常将其归因于政治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其实,除了政治宣传

①关于“大隐”说法不一。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也有“小隐隐山林,大隐隐于市”,“大隐隐朝市,小隐隐山林”等不同说法。

②佛教有三千小世界、三千中世界、三千大世界、三界等种种概念。如三千小世界组成一个中世界,三千中世界又组成一个大世界。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概念可能也受到佛教“世界”认知的影响。

③梁启超:《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80-381页。

④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884页。

⑤梁启超常用“脑质”来描述精神。

的社会功能之外,小说之所以被强调的原因在于,小说在创造“世界外之世界”上比其他文体更占优势。因此,梁启超讲:“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作为世界的文学”(或说“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在哪里呢?“文学世界”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根据“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梁启超借助“小说”,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回答。一是“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同层面。两者的区别实现了“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二是“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相通层面。这个相通层面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行之不知”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前者指人生在世常常行动大于思想,忙碌于事而无反思,对于自己的经历、思想乃至想象“习焉不察”。我们可以概括为入于世界但是没有反照、反思,其性质为“麻木”。后者不同于前者的是,有反照、反思但是却没有结果,其性质是“茫然”。这两类人生境界的相同之处在于,能入世界而不能出。因此,当有人将“行之不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生体验创作为文学,就能激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感”,产生共鸣。

在梁启超看来,“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通层面和相异层面并非是截然区分的。“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①同时,根据相通层面和相异层面,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别:理想派和写实派,实质上只是侧重不同。相通层面和相异层面是文学的一体两面。

结语

“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作为群治的文学”和“作为世界的文学”是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的核心,三者层层递进,逐渐深入。“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观念明确了文学为谁的主体性问题,并统摄了后两个观念,从国民出发思考文学乃至社会、革命等现象成为新的思维方式。由于当时的清朝与理想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样态相去甚远,国/民之间的认同出现矛盾,“群治”成为替代性社会改造话语。在梁启超前期思想中,国民话语和群治话语时常可以互换,区别在于后者更多偏向国民合群性意识改造层面。从“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观念到“作为群治的文学”观念,隐含着“启民智”的观念认识宣传到精神意识改造的深入。“作为世界的文学”观念则是从理性观念到精神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是对文学本体性的确认。

学界常采用功能论、工具论的视角评价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忽视了梁启超文学思想始终都是在不断调整,不断演变的事实。甚至有学者认为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重视情感和审美本身,将此“情感诗学”“情感教育”视作对前期功能论、工具论的校正,并将此“转变”的原因归结为欧洲游历,^②忽视了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内部演变和复杂性。“作为世界的文学”观念的提出,可以解释梁启超20年代的重审美、重抒情、重文学思想演变并非突转,而是有内在的持续性,其实是对国民性启蒙思考的持续深入。

除了提高小说的地位和促进现代意义文学的生成,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赋予文学改造现实的精神品格,其路径则是从下到上的新范式,文学尤其是小说通过改造国民进而影响社会变迁。这影响了现代文学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并在鲁迅、茅盾、赵树理、丁玲等小说家的创作中一脉相承。

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所蕴含的“作为世界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它对“文学”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不仅具有原初意义,而且极具阐释力和独创性。二十世纪有关“文学”和“世界”关系的思考大致在两种极致模式中摇摆: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重申文

^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884页。

^②张冠夫:《摆渡于传统文学与新文学间的‘情感’之舟——19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诗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张冠夫:《从‘新民’之利器到‘情感教育’之利器——梁启超文学功能观的发展轨迹》,《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学自身的审美价值；民族国家话语、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后殖民研究等又有将文学简化至“政治”的危险。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强调文学外部研究都无法充分阐释文学和世界的关系，也无法对文学做出全面而灵动的阐释。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提供了“文学”和“世界”的新想象关系。“文学”不是超然于现实世界的审美世界，而是通过超然现实世界之外从而进入、干涉现实世界。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文学”实际上是既能入世界又能出世界的。同样，借助“文学”，作家和读者保持了与世界“既入又出、既出又入”的两间关系。

与一般将审美情感视作文学本质的认识也有区别，梁启超前期的文学观念更强调作为整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其性质是对于世界整体的人生体悟。这种人生体悟包含了情感和认知，甚至还有“行而不知”“不知所以然”等体验在内。梁启超文学观不仅强调人对世界整体的感悟，而且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整体性。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就是放到当下也极具包容性，也更具解释文学现象的灵活性。

The Generation of Liang Qichao's Early Concept of "Literature"

LIU Bao-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modern sense, Liang Qichao's contribution is indispensable. However, Liang Qichao's early literary ideas were often regarded as literary functionalism and despised. The genera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Liang Qichao's three internal concepts: "Literature as national education", "literature as mass governance" and "literature as the world". Liang Qichao's early literary thought not on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affec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maintains the rich and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real world.

Key words: Liang Qichao; national education; mass governance; the world; Modern literary concept

[责任编辑 唐音]